

[法] 埃里克·泽穆尔 著
胡宗荣 马彦华 译

法官們的政變

花城出版社



Grasset

花城出版社

法官们的 政变

〔法〕埃里克·泽穆尔
胡宗荣 马彦华 译

根据 1997 年 Grasser er Fasquelle 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官们的政变/(法)泽穆尔著;胡宗荣、马彦华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9

ISBN 7-5360-3315-X

I. 法... II. ①泽...②胡...③马... III. 纪实—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622 号

法官们的政变

〔法〕埃里克·泽穆尔 著

胡宗荣 马彦华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 插页 140,000 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50 册

ISBN 7-5360-3315-X

I·2777 定价: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纪实性的作品。

该书以叙述和事件相交叉的笔法，讲述了法兰西长期以来不合时宜、严重羁绊社会发展的古老的司法模式，在内部困扰、外部文明的刺激之下，诞生了一种顺时应势的法官革命思想，并横空出世了以爱娃·约里、雷诺·冯·鲁姆贝克、菲利普·库鲁瓦、埃里克·阿尔方法官为代表的当代司法英雄。他们以警察——法官——媒体三方联盟的环扣方式，成功地实现在全新的民主立法制度下控告一位位大人物：老板、议员、市长或前内阁成员……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对抗，传讯他们，对他们立案审查，使法国的新型法官的办案手法达到一种前所未有、几近滴水不漏的高度，最终实现以卓越的真理的人权名义，以法制国家的名义改良社会，由法律原则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

本书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许多当今法国政坛、司法界鲜为人知、耸人听闻的腐败内幕。自 1997 年面市后，本书成为法国的畅销书。

献给我的母亲

第一章	当代英雄	1
第二章	法官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	45
第三章	三方联盟	83
第四章	法官之法	119
第五章	以人权的名义	157
结 论	美国之梦	187

第一章

当代英雄

一 黄皮信封

时值 1951 年。著名律师雅克·伊索尔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立法竞选。鉴于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的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建议他：“去找卡多看。”他惊愕不解的神情令他们好笑，于是他们便给他解释：卡多既非巴黎夜游巫师的绰号，也非秘密警察的代码，而是现正负责选举事务的前任省长的姓。多年以后，律师在回忆他的这段往事时十分健谈：“我去他家时，就像去逛窑子的人一样，生怕被人看见、被人认出来。”这位卡多先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不动声色地接待其来访者。面对这位初次光顾“妓院”、显得局促不安的候选人，他说出这么一句彬彬有礼的话：“那么，请给我谈谈您的计划吧……”对方受到了鼓舞，于是便满怀激情地开始描述他梦寐以求的司法改革。然而，几分钟以后，前省长打断了他的话，摇了摇发出清脆响声的小铃。一位女秘书走了进来，目光呆滞、动作机械的省长发话：“小姐，请拿一个黄皮信封^①来。”惊得目瞪口呆的候选人未作告辞便悄然离去。

^① 信封，在法语中亦指“红包、贿赂”。这里正是此意，故有后文“惊得目瞪口呆”一说——译注。

整整一个世纪，法国的政治生活都按照黄皮信封——当然也有蓝色、白色和红色的——的节奏进行。所有的候选人均得求助于来自后台老板或马提翁专用基金这类神秘资金。共和国的大人物们正是这样支付了他们的选举：从克莱蒙梭到戴高乐，从普安卡雷到孟戴斯·法朗士，从甘贝塔到莱昂·布卢姆无一不是如此。人们大可为之辩解，称正是这种不合常理的非法提供资金的方式，才促成了当今的民主进步，而正是这种进步也才使得一些没有财产背景的人，仅靠某些成功的机遇便敢于投身选举大战，参加竞选。然而，并非人人都是马塞尔·达索。诚然，这种制度也非完美无缺，不过，人们大可一试。当然也有丑闻，共和国的历史充斥着这类丑闻，从巴拿马到土地保险公司，从斯塔维斯基到阿朗达，金钱和政治、操纵者和当选者都搅合在一起。长期以来，君主主义者就看清了这种类型的原罪并使之当众出丑。确实，旧制度没有这样的耻辱，即公私有财产混淆不分的情况；财政总监富凯以私人贷款支撑着当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而马扎兰，这位出身卑微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撒手人寰时已是欧洲首富，他将巨额的遗产留给了经他精心安排而与法国王室联姻的一群既尖酸刻薄而又不守妇道的侄女们。数月前，在雷恩地方法院审理亨利·埃马尼利一案时，又重演了一次这些极为古老的习俗。为了谴责社会党及其财务主管，检察官提到了天主教西方十字军远征者的精神和旧制度的廉洁。被告不再负隅顽抗了，说他作为国民议会议长，在拉泽酒店小住时让人发现了由布尔邦公爵夫人、太阳王路易十四之女送给她情夫的这件华贵礼物，“无疑，这只能是他的劳动所得”！

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老掉牙的诉讼纷争了。法国早就作出了对之不予理睬的抉择，决定对其脏乱的背景加盖遮羞布——甚至套上虚伪华丽的外衣。国家不能容忍为民主生活付出代价，也不能让政界人物享有特殊需求的权利。当他们尚不为官时，通常他们能找到为之提供经费使其进入内阁的资助人，尔后资助人再协助他们等待重新掌权的机会。乔治·蓬皮杜在戴高乐举步维艰之时便涉足罗特希尔德银行。有趣的是，40年后，在爱德华·巴拉迪尔和他的办公室主任尼古拉·巴齐尔——此人正是乔治·蓬皮杜的亲密合作者——之间，又故伎重演。从1990年到1993年，巴齐尔还接受汤姆逊公司的资助，当时，在圣·日尔曼大街，他把他的时间和极大的聪明才智大部分都花在为其主子进入马提翁的种种准备工作上。就罗特希尔德家族而言，再度进行政治投资的动机是微妙而不可捉摸的：出于友谊？碍于关系？自身的想法或某种生存艺术？有时，也并非那么微妙、那么不可捉摸：用于支付没有补偿的公共补贴，用于国家以高价收购困难的企业，用于跟国营部门签署某些奇妙的合同，等等。无疑，这些高雅的银行家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老祖宗晋见国王路易·菲利普那遥远的时日，当时国王陛下当着他的面开启了他竞争对手们的信封，并允许他心安理得、十分泰然地向国家这个市场投标。而时至今日，仍有人保留着他这种新贵的艰辛习俗：汤姆逊的董事长阿兰·戈梅希望，通过向巴齐尔和巴拉迪尔提供资助的方式，将他作为国营公司领头人的委任期延长两年。这一点，他办到了。同样，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也立即向他的朋友帕特里斯·佩拉表示了谢意，后者因娶了一位名叫拉蒂格的女继承人，早就发了大财。他资助密特朗尽可能好地度过了他执政前漫长的23年：自1982

年起，他的瓦莱奥公司在最后一刹那被增补进了国营企业的名单，公司的股东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当然，这一切都是按照爱丽舍宫的特别旨意完成的。

长期以来，左翼都是被排除在这类游戏之外的。各企业在聘用他们首脑人物的问题上都显得犹豫不决，更不用说让他们掌管财务了。在皮埃尔·若克斯的统帅下，70年代的社会党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作为法国总工会的战士，若克斯保留了共产党人的方式，然而，自20年代起便受人鄙视的法国共产党却建立了一套研究室系统，这些研究室负责强制各企业与其党的地方组织形成契约关系。依照这种模式，社会党人也创立了URBA^①。按合同，比例定为3%，URBA并不向社会党上交一分钱，但却要支付一大批诸如津贴、会议、集会和竞选活动的经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早就指出：“只有两种社会党人，一种是过于狡猾而另一种则是不够机灵。”一切都清清楚楚：社会党人把革命的捐税引进了我们宁静的生活，并且认为，较之于使用大亨们的钱财或右翼动用瑞士银行的账户，这类捐税还算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进步。廉洁的老战士、URBA的掌柜热拉尔·莫纳特，仅靠自己的工资收入便可过得高枕无忧了，而右翼各政党的经纪人则毫不犹豫地提取佣金……每当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人们都可以看到大腹便便的莫纳特那张通红的笑脸。他站在食品台前，慷慨地向与会者、他志同道合的同志送上一瓶香槟。1982年，当莱奥塔尔、马德兰、隆格控制了独立共和派时，

^① URBA系拉丁词“城市”之词根，这里指社会党创立的一种为其活动提供经费的基层组织——译者注。

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其政党命名为共和党，命名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一心只想着要报复的下台总统——给了当时掌管着已见箱底的财务负责人热拉尔·隆格惟一条建议（自持傲慢、坚信必然能胜利的吉斯卡尔政权丝毫没有准备失败后的退路）：“有一个榜样，那就是 URBA，我们应尽量照着办。”

二 平板构造

那只是以后，很久很久以后……一种要求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需要，用强光照亮了这些令人怀疑却又普遍存在的做法。当时，正如胡乱买彩票一样，法官们随意选定那些无辜的罪人而忽视罪人的无辜。他们预审了社会党财务负责人埃马努埃利而不是皮埃尔·若克斯的案件；他们声音发颤地愤怒申斥弗朗索瓦·密特朗用于 1988 年竞选的财务支出，而对希拉克在 1981 年竞选中或吉斯卡尔于 1974 年竞选中的花销却又只字不提。他们将热拉尔·隆格的丑事公布于众，在指控他的罪行中，有为了顺利赎买公司而滥用工业部通讯册之嫌；而对于同样是工业部长后来当了企业顾问的多米尼克·斯特洛斯·卡恩却又秋风过耳，听其自然。长期以来，法官们对各政党的财务收支极少过问，往往把那些过分技术化的细节打入冷宫。而现在，这些东西却成了热门的抢手货。政治成了他们首选的猎物，而就在几年前，他们都还在诚惶



诚恐地回避。对于牵扯上法庭的持械抢劫犯、不法商人、拉皮条者，法官们有时会感到厌烦；而对于当权者和企业主这一类头面人物，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品尝势均力敌争斗的刺激，领略微妙冲突和巧设陷阱之神美，战斗的伦理总是道德与政治的较量、理想与妥协的交锋。

可是，请大家不要上当，要知道，道德本身就是一项政治计划，一种方法或一个目的。当罗伯斯庇尔想消除丹东及那些鼓吹宽容、减轻恐怖的人的影响时，便指控他们于1792年8月10日明目张胆地接受了贿赂；当科贝尔想摆脱富凯时，他便揭露后者玩弄财政手腕，而正是这些手腕才挽救了投石党运动时期的法兰西王国，使之幸免于难；在巴拿马丑闻和斯塔维斯基事件中，反动的极右势力两次以为卡住了共和国的脖子，它会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于1940年7月终将共和国扼杀。这一次亦然，对政界人物荒唐丑事的揭露既非没有背景、也非偶然为之，而是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整个司法前哨就是如此，它服务于一种意识形态。当皮埃尔·特律舍，当时里昂地方财政检察长，于1972年对假发票一案提起公诉时，他的行动是司法工会反对白领违法长期思考的直接结果；也是其同志们提出的运用司法部门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具体体现。今天依然如此，滥用社会财富这一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延伸有一个明显的目标：扩至政治阶级长期忽视的致命弱点——各政党的资金投向。这是正统的司法方式极难办到的，所以采用这种迂回的办法揭露贪污腐败——在这种越来越审慎的攻势面前，一位律师提出“以有组织的司法对付有组织的犯罪”——两个互不相识的阶层相遇晤面、两块大陆发生碰撞。然而，平板结构是一种没有人能掌握的科学。司法揭露政治，带着先天性的恐惧和机灵的

傲慢；当权者看待法官，首先是居高临下的蔑视，继而是不可理喻和惊慌：他们进入了一个其规则对他们说来完全是陌生的世界——他们原以为，玩弄任何规则，他们都会是行家里手；他们进入了一个甚至连语言对他们说来都是陌生的全新领域——他们原以为，玩弄词藻，他们是举世无双的天才，别人才是笨蛋。然而，他们闯进了任人合伙追逼的人群，这帮由法官、检察官甚至他们自己的律师所组成的人群，在圈外人难以理解的天地里尽情嬉戏，而他们却在那儿苦苦挣扎。长期脱离现实，他们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法官们追问的那些钱财的去向和方式。囿于日常的琐碎，法官们对于政党、部委、企业的运作也同样一无所知。他们要么天真地臆测，要么主观地推断。他们不具备美国那种法警手段，也未掌握意大利那种法官权力，他们只能盲目摸索；而政治家们则广泛地侥幸探测。敌对的双方都深信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曾见过自己的同行或多或少受到过类似指控的市长、议员、部长或省议长，就像手指沾满了果酱的孩子，心里纳闷“我怎么会是这样？”除了几种非典型的情况，他的确没有从钱柜里拿过钱。法官办事同样也凭着自己的良心。1990年法律颁布前，司法上对政治投资表述的含糊，个人致富与集体致富的细微区别等等，他都未加在意：“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黑手党一个成员按家族的旨意杀了人时，他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整个家族的利益，家族将会给他以舒适和福利。并不是因为没有有关政治投资的法律、也不是没有有关滥用社会财富的法律，而是因为存在着舞弊、存在着贿赂等等^①，”类似黑手党的做法并

① 埃里克·阿尔方致作者——原注。

非无辜。某些法官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即“清扫奥吉亚斯牛圈（对贪污盛行之处进行大力整顿、清理）。”司法对政治长时期的无知，认为贿赂是人与生俱来的第一天性等等，这些东西使他们发现，在每一次司法调查的背后，都有政客的一种不可告人的想法，有对手玩弄的花招，右翼针对左翼，左翼针对右翼，甚至中间势力针对中间势力。厚颜无耻也好，天真无邪也好，总之，凡是于对手不利的任何司法行为，他们都予以支持。右翼吹红 URBA 的炭火；左翼推出攻击让·蒂贝里和巴黎市财政开支的重炮。餐桌上，人们纷纷议论，说希拉克总统将尽一切可能避免 1998 年与利昂内尔·若斯潘共盟同治，他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在旺多姆广场^①出现一位社会党人，这会让法官们随意想像保卫共和联盟的那些阴暗秘密。政治家们的行为举止对历史学家说来，就跟鲸类自杀一样显得不可理喻。由于法官既非右翼又非左翼，他们下意识的虚无主义便促使他们去摧毁那种他们认为是已经腐败和不道德的制度。他们想通过清查各政党的开支、核实其滥用社会财富的情况、多少有些审慎地使用监狱这种武器来弄清事实真象。为了摧毁人的意志，打下其嚣张气焰而使之开口说话，他们肆无忌惮地将人进行三天、五天、个把礼拜的关押，无非是施加心理压力和进行精神折磨。企业家马兰一旦供出卡里尼翁便立即获释，前议员德特拉特交待了——根据他个人的推测——埃马努埃利所扮演的角色后也重获自由。警察常常忠心听命于司法人员。近来，他们养成了每次搜查都将现金全部查封的习惯，好像这些钱都是赃款。在局子里，他们粗暴对待、甚至凌辱

① 社会党总部所在地——译注。

谩骂那些大人先生或显贵的夫人们，与对待一般的小无赖别无二致。而且，还美其名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上了省长的前阿兰·卡里尼翁办公室主任，由于拒不供出后台而被人绑在暖气散热器上达两天之久，且还半裸着身子。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时期的爱丽舍宫前秘书长、一位伟大的抵抗主义战士的儿子克劳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也受到过同样的待遇。斯托伊克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了解法国警方的工作方式。”还有别的不少人都忍受过这类受凌辱的命运。审讯时，就像想把他们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一样，某些法官喜欢追问他们童年的往事。要说他们的生活就是杀人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布尔迪厄或富科这样的例证。重新阅读审讯笔录，仔细删除不便公诸于世的段落，再对法官的表现进行一番粉饰，那么，剩下的就只是对被告不利的东西了。很少有政治家，像被冯·鲁兰伯克法官传讯的前社会党议员劳德·热尔蒙一样，站在女书记员背后，让她听写——并检查——自己的话。尔后的公开审理将可能恢复指控与辩护的平衡，但却为时已晚：警方、法院、新闻媒体三方早已使舆论形成定论，再也无法扭转了。毁损人的声望、使之掉价跌份甚至降服归顺的目标已经达到。罚款、监禁、取消被选资格这种惩处的三部曲从此成了传统，法官取代了立法机构进行量刑。而按照 1789 年人权宣言的规定，只有后者才有这样的权力。当被选资格被无情地取消后——过去对犯人只不过是取消公民投票权——当权者便被剥夺了他们最后的保护、最大的自豪、最高的优越感和最稳固的合法性。就像不敢承认、但事实上却在准备的大换班一样。